

# 大学传统文化理论性教育的主体思路研究

陈 静

(福建商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12)

【摘 要】针对传统文化所指的抽象性造成教育内容定位不清的困境, 大学传统文化理论性教育的主体思路应当立足中国历史进程有别于他者的独特表现, 解析政治制度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对国家的型塑机制和内在动因; 结合传统文化体系的稳定性, 理性探查利益最大化原则对文化的造就作用; 辩证分析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发挥的正面与负面作用; 结合当代与传统之间在大国体制方面的关联, 探析传统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当代意义。建构上述思路的目的在于引领大学生通过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历史角色和当代价值, 由衷而生文化自信力和自觉性, 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关键词】传统文化; 理论性教育;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00(2022)04-0095-06

2014年, 教育部出台《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大学传统文化教育随之兴起, 其理论性教育以课堂为主要载体, 引领学生读懂中华民族的文化密码, 提升文化自信力和自觉性, 实践性教育则通过课堂之外的活动与理论性教育形成相辅相成的局面。由于文化所指的抽象性, 目前理论性教育的研究处于多元化的局面, 多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sup>[1]</sup>和“语言、文学、历史知识”等内容<sup>[2]</sup>, 难以形成区别于德育、历史、文学等课程的独立面貌, 也不同程度影响实践性教育的效果。理论性教育是大学生提高知识水平的主要途径, 大学传统文化理论性教育应区别于中小学, 建构有逻辑性的体系, 使学生由“论”而“用”, 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

文化是国家、民族有别于他者的重要标志。汉字典籍、儒家理念、宗教信仰、节庆风俗等传统文

化是“中国”由抽象概念化为真实存在的依据。五千年之久的中国文明从未发生断裂, 而与中国文明先后发生的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或者断裂或者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 中国的历史风貌独树一帜。文化型塑出中国的独特风貌, 文化的成因也有内在的逻辑。大学传统文化理论性教育的主体思路应从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性出发, 探查文化型塑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具体表现、运行机制、内在动因, 辩证认识文化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 在历史与当代的关联中, 定位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促使大学生由衷而生文化自信力和弘扬文化的责任感, 并能够理性面对现在与未来。

## 一、认识中国历史进程的独特性

17世纪, 欧洲各国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形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国林立的局面<sup>[3]</sup>。中国与欧洲地理面积相当, 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局

收稿日期: 2022-04-02

基金项目: 2020年度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大学传统文化理论教育的学术建构研究”(JSZM2020052)。

作者简介: 陈 静(1973-), 女, 福建福州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文化教育。

面,是一个政治成熟、疆域广阔、多民族融合的大国。

距今5000年左右,黄河、长江、辽河流域产生了如“漫天星斗”般的原始族群,彼此之间为生存而不断兼并融合,其结果是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黄河中下游产生了最早的“中国”。已有研究中,最早的“中国”字样出现在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指的是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sup>[4]</sup>。周王朝建立“封建宗法制”维系天下秩序,拉开了政治“中国”的帷幕,中国的地理空间由“中原”即黄河中下游地区不断延伸。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帝国完成了黄河和长江流域农耕区的整合,之后历经两汉、魏晋、隋唐五代、宋辽金的分分合合,至13世纪蒙古政权建立的元朝完成长城南北的大统一,实现了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的融合,在此基础上,18世纪中叶的清朝形成了今日中国的广阔疆域。

伴随空间中国的延伸,中华民族应运而生。晚清的梁启超受欧洲民族主义的启发,根据国家和民族的对应关系,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sup>[3]389</sup>。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华民族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多元融合的民族。在历史中国的进程中,中原地区不断被周边民族入侵,但没有被取而代之,而是与入侵民族不断融合。公元2世纪末到6世纪末,匈奴、鲜卑、羯、氐、羌逐鹿中原,实现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契丹、女真与北方汉人融合,西夏、西亚、中亚各族人与蒙古人一起进入中原和南方,实现第二次民族大融合<sup>[5]</sup>,多元民族长期融合成中华民族。

## 二、探查文化对中国的型塑作用及内在动因

### (一) 文化对国家的型塑

民族融合造成多元文化互化和共同建构的局面,中原文化一直占据核心地位,其面貌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辽、金、元、清四朝,虽然统治民族的汉化程度有深有浅,但国家治理方式基本上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有国号、有年号;国家机构是中国的,可以远溯周礼,近追唐宋;虽然统治民族创立了自己的文字,但是汉字与其所承载的文化仍然在延续,弦歌不绝;……科举在举行,

儒家经典教育出来的士大夫仍然怀抱着修齐治平的理想。”<sup>[5]31</sup>文化的赓续标志着中国的赓续,成就了历史中国未曾断裂且“如滚雪球”般壮大的独特风貌,地理空间由中原充盈到草原和高原。学界因此提出了“中原文化向心力”的说法,即中原文化产生的向心力如漩涡般卷入周边的民族和地域,逐渐型塑出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共同体<sup>[6]</sup>。

### (二) 文化型塑中国的动因来自财富的驱动力

中原文化型塑中国的动因,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看法是把文化放在“生存为人类第一要义”背景下的解析。张光直先生提出“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sup>[7]</sup>无论是空间中国的延伸还是民族融合的发生,都是政治和经济结合的结果。草原民族入侵中原的行为是为了获得更优越的生存资源,入侵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原文化不约而同的选择同样是为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赵汀阳先生提出“逐鹿游戏的消长与进攻者或防守者的经济学考虑之间有明显相关性。在经济和军事能力范围内,竞争各方可承受成本的最大值与收益最大值的比例决定了是否进行军事冒险,进攻或防御都发展到控制了最优之可及资源为止。”<sup>[6]24</sup>这里的“逐鹿游戏”即各民族对中原农耕区的争夺。具体的地理区域包括“阴山山脉和辽河中游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内地。”<sup>[8]</sup>这里分布着面积和产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农耕区。草原的经济产出远远低于中原农耕区,草原民族进攻中原农耕区,以低成本实现了高收益。因此,草原民族热衷“逐鹿游戏”,辽、金、元、清等政权因此而来,中国地理空间的延伸也随之而来。

中原汉族在长期生存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与农耕经济基础高度契合的文化体系,包括政治制度、财政体系、社会组织结构、哲学宗教思想等文化元素。中原农耕区的高产出正是建立在这套文化体系有序运转的基础上。入侵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原文化体系不约而同的采纳,表现了一致的理性,也证实了中原文化在生成财富方面的说服力。文化型塑出超大规模中国的动力极大可能在于财富追求驱动

下的利益最大化。

### 三、解析传统政治制度文化对中国的型塑

中原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要素是政治制度,其中蕴藏着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肌理、解码历史风貌的重要线索。中国古代经历了封建制和集权制两个阶段,前者在历史舞台上匆匆亮相后就让位于后者,中国地理空间的延伸和民族融合的进程主要发生在集权制时期。

#### (一) 西周封建宗法制对中国的型塑

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建立封建宗法制,以分封和联姻的方式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局面,以血缘纽带联系形成稳固的宗族社会结构。西周封建制的本质是君主依靠诸侯统治天下,诸侯依靠贵族统治平民。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技术的出现,平民耕种私田即可谋生,逐渐摆脱贵族的统治。竹简的出现,加速了知识的传播,发端于没落贵族的“士”阶层随之兴起,给君主提供了组建官僚集团的前提。诸侯国纷纷变法,形成区域集权、彼此争霸的局面,架空周王室,瓦解封建制。封建制落幕后,维系封建社会关系的宗法制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宗族一直是社会基层组织的重要单位。宗法制约束宗族内部秩序,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格局,成为集权政治的重要补充。宗法家长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使每个宗族宛若帝国统辖下的无数隐形邦国。

#### (二) 集权帝制和官僚政治对中国的型塑

秦之后的两千多年“百代都行秦政法”<sup>[9]</sup>。其基本政治格局是集权帝制和官僚政治,“皇帝”为最高统治者,帝位采取世袭制,“皇帝”通过官僚集团实现中央对地方的集权统治。官僚集团由中央和地方两部分组成,中央政府负责统筹全局,地方政府负责地方事务并服从中央,官员选拔和任免权集中于皇帝,任何官职都不能世袭。

历史中国在集权帝制和官僚政治的型塑下,以王朝更替的形式绵延了两千余年。王朝兴衰的原因虽然复杂多元,如果从财政体系的运转逻辑看,可以整理出一个基本的线索。官僚集团运转着的帝国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时,王朝平稳运行;王朝陷入困境时,如果不能重新实现平衡,则改朝换代。

官僚政治经营下的帝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税,次要来源有工商业税以及基于君主特权的卖官鬻爵、官员赎罪金、民众捐献等;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是供养皇族成员、官僚、军队以及济贫赈灾等公共事务<sup>[10]</sup>。土地的刚性决定了帝国主要收入“土地税”数量的固化,帝国常在人口膨胀、军事行动增加或者自然灾害发生时出现财政赤字,政府应对财政赤字的举措通常是“开源”或“节流”。比如,汉武帝远征匈奴,耗空了文景两代的积蓄,于是卖官鬻爵、滥发货币<sup>[11]</sup>。再如,唐玄宗为了减轻地方军事力量给中央财政带来的压力,把藩镇的财政权和军权交由节度使,埋下了安史之乱的祸端<sup>[11]233</sup>。类似的“开源”及“节流”都不能根本解决帝国的财政危机,反而给帝国统治埋下祸端,最终造成帝国的灭亡。历史通过改朝换代的更迭重新步入帝制和官僚政治运作下的财政体系的平衡,直至近代被西方的枪炮打断王朝的循环往复。

#### (三) 政治文化背后的推力仍然是来自财富的驱动力

西周封建制的建立,结束了夏商时期以武力征服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大飞跃,但封建制在历史舞台上匆匆亮相之后,便被集权帝制取代,后者绵延两千多年,直到近代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之下被中断。集权政治是形成大国组织形式的基础,在其支撑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中国总能从分裂走向统一,并日益壮大。集权政治和大国形态,通过长时间的考验和筛选,成为了历史中国的理性选择。究其内因,依然要从前述的产生文化向心力的内在动因“财富的驱动力”中寻求答案。

中原农耕区连续成片,地形平坦,有利军事,不利割据。如果形成林立的小政府,跨区域协作效率低,军事竞争在所难免。相比之下,大政府的跨区域协作效率高,军事竞争可以避免,财政收益极大可能高于小政府之和。例如,黄淮流域的土地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河流泛滥频繁,严重影响国家安危,由于流域广阔,河流治理是个跨地域的超大工程,需要超越区域利益的政治协作,大政府集权政治的效果显然好于小政府的割据政治。再如,建设交通网络,建立大市场,开通大运河,

实现南北物资流通等都是需要跨区域协作的超大工程。因此,大国成了历史的理性选择,能够有效运作大国的集权政治文化也成了历史的理性选择。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没有随封建制退出历史舞台,也在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动。宗法家长制下的社会秩序,填补了集权政治下基层组织结构的空白,极大节约了政府的统治成本。

入侵民族政权对农耕区和非农耕区的“两制”、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羁縻制都是集权政治在利益最大化原则驱动下表现出的智慧。辽的“北院”、元的“宣政院”、清的“理藩院”都是管理非农耕区的政治机构<sup>[12]</sup>。其管理机制虽然与农耕区的集权制不相同,但目的是基于游牧生态基础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边疆地区的羁縻制强调因俗而治、因地制宜进行有限度的自治,从历史的经验观察,自治程度的松紧通常取决于政府的财政能力,政府财政充裕时,经常派驻官员亲政,地方首领辅政;财政紧张时,则常由地方首领全面主政。

总之,集权政治下的大国体制及衍生出的政治智慧,之所以成为历史的理性选择,原因在于唯有如此资源才能产生最大的利用效率,即利益的最大化。文化型塑出国家和民族的样貌,而利益最大化原则造就文化的风貌。

#### 四、解析与政治契合的精神心理文化

精神心理文化与政治文化相辅相成。儒、道思想和宗教信仰作为传统精神心理文化的主体,高度重视与集权政治之间的契合,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功能,与政治文化共同型塑了大国形态。

##### (一) 与政治契合的儒家、道家文化

孔子创立儒家,是为了重整“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汉代董仲舒的“儒学”提出“天人合一”和“纲常名教”,前者解决了君主身份的合法性,后者建构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宋代朱熹建立了“理学”,即巩固了中原文化的正统性,又满足了集权统治的教化需求。

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其内涵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出发点是经世致用的政治性考量。汉代立国之初采纳了道家“无为”之策,统治者与民休养生息,削减徭役赋税,

其目的仍然是充盈国库,稳定王朝统治,不是无所为地放任民众,是顺规律而为的策略。

##### (二) 与政治契合的宗教文化

本土的道教以及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都通过与官方之间的密切互动争取社会影响力。与此相应,官方对宗教中的超自然力量,实行世俗化的监管手段。皇帝垄断了祭天仪式和对天象征兆的解释权,发生灾害、瘟疫时,地方官到宗教场所组织祈求活动,安定人心。从唐宋时代开始的度牒制,即神职人员注册制,一直延续到民国。清代,修建寺庙要经过礼部审批。世俗政权还可以支配宗教证明皇权的合法性,加强政令的权威性,维护社会治安等。另外,中国古代宗教还呈现了多神混杂的信仰体系,弥漫性宗教超越制度性宗教,普遍地渗透进了世俗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宗族秩序、政治网络的一部分<sup>[13]</sup>。

##### (三) 儒、道及宗教文化对个体人格的塑造

儒道思想和宗教信仰在对个体人格的塑造方面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局面。儒家在宗法制伦理和秩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关国家、社会、个人的学说,体现了个体对君主、国家、社会的高度趋同,主要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正心笃志、自强不息的个人修养。儒家的价值体系是社会思想的主流。

道家思想和宗教信仰虽然和儒家的表现方式不相同,却同频共振维持主流价值体系。道家提倡的“个体自由”给儒生提供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宗教信仰首先安抚了民间的精神世界,其次给养了精英阶层。它们都没有站在儒家的对立面,而是填补了儒家在精神建构方面的空缺。

##### (四) 哲学宗教影响下其他精神心理文化的同质化表现

受儒、道思想和宗教信仰辐射出的教育、文学、艺术等文化也表现了同质化特点。以教育来说,契合政治的儒家思想是教化的主要内容。汉代设立“太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传播董仲舒的儒学。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儒生科举的考试用书,风行几百年。承担教化任务的儒学在官僚选拔

和晋升体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塑造了帝国历朝历代的精英。在儒家德化思想的浸润下,文学艺术形成了关注现实的理性精神。“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气韵胜过技巧的写意手法、委婉含蓄的中和之美。

#### (五) 精神心理文化与政治文化契合的内在机制

在利益最大化原则驱动下,大国形态和集权政治成为历史中国的理性选择,作为权力机构的国家必定以“大国集权”为既定目标,因此与目标相契合的精神心理文化成为理性选择,在权力的作用下,嵌入人才培养和选拔体系,并伸展到文学艺术等载体中,反作用于权力世界,稳固权力的根基。反之,与既定目标不契合的内容则淘汰出局。精神心理文化因此与政治文化形成互动,共同型塑了帝制中国的大国体制和王朝更迭的规律。

#### 五、理解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 (一) 辩证看待传统文化的两面性

传统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深度契合,形成了稳定的文化体系。一方面,使中国在十七世纪前长期领先世界其他地域,实现了农业大国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使中国形成了封闭的局面,长期循环在农业国家的局面中。恒定的土地资源无法负荷过剩的人口时,大多要通过饥荒、战争等自然或人为的灾难削减人口,以重新达到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平衡。

##### (二) 理解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19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打破了封闭的局面,历经磨难,直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逐步打开新局面。与帝制中国相比,当代中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缔君主制,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的经济重心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但是大国体制并未与传统发生断裂。地方服从中央的层级关系、各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仍和传统政治有着内在的联系。造就文化的自然条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资源的最大利用率原则依然在发挥作用,曾经长久维系大国的文化价值体系依然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 1. 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价值

“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sup>[14]</sup>历史传承的一些治国理政智慧融在文化血脉中,在今日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例如,“我国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体系,既契合了我国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一统的文化传统,又吸收了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成果,充分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sup>[15]</sup>从上世纪的改革开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制造”等关键性的历史飞跃,都离不开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发挥的主导作用。再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学习历史上的反腐倡廉、国家治理以及吏治经验的精髓要义,以便创造性地运用到治国理政中。

#### 2. 传统思想文化的当代价值

在大国体制的传承中,维持社会关系和建构个体人格的思想文化也未和传统断裂。中华民族文明之初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这些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sup>[16]</sup>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中,传统思想文化还可以为解决全球困境和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启示,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儒家文化中“兼济天下”的担当情怀和“尚和合、求大同”的治理思想,是对全球治理框架和体系的一次创新,有利于促进世界长久、可持续发展的繁荣和发展<sup>[15]</sup>。

#### 参考文献:

- [1]陶国立.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 新时代大学的重要使命[J]. 现代教育管理, 2020(8): 55.
- [2]任翔.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初探[J]. 中国教

- 育学刊 2019(8):59.
- [3]许纪霖. 脉动中国[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21.
- [4]许倬云.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5]赵冬梅.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21.
- [6]赵汀阳. 中国做为一个政治神学概念[J]. 江海学刊, 2015(5):16-24.
- [7]张光直. 考古学专题六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 [8]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9]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0]郭守刚. 财政中国三千年[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20.
- [11]郭建龙.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M].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16.
- [12]施展. 枢纽:3000年的中国[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13]杨庆堃.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 范丽珠,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 [14]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EB/OL]. (2014-10-13) [2022-04-01]. [http://www.gov.cn/2014-10/13/govweb/xinwen//content\\_2764226.htm](http://www.gov.cn/2014-10/13/govweb/xinwen//content_2764226.htm).
- [15]李军. 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EB/OL]. (2020-09-28) [2022-04-01]. [https://news.gmw.cn/2020-09/28/content\\_34228279.htm](https://news.gmw.cn/2020-09/28/content_34228279.htm).
- [16]人民日报. 贯通中华文脉 照亮复兴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激活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贡献述评[EB/OL]. (2022-01-04) [2022-04-01].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22/0104/c1001-32323907.html>.

## Research of the Main Idea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Theory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 Jing

(School of Liberal Studies,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2,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edicament of the unclear positioning of educational content brought by the abstract natur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main idea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uniqu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analyze the shaping mechanism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culture and spiritual psychological culture on the country. Comb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rationally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interes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e, and make a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histor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and traditional systems of a giant coun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culture.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the above ideas is to guide students to develop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consciousness by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o as to better cope with the present and fu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oretical education; contemporary value

(责任编辑: 练秀明)